

黃克武評：劉禾著《跨越語際的實踐：一九〇〇至一九三七年間中國的文學、民族國家文化與被翻譯的現代性》

書名 .. *Translingual Practice :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作者 .. Lydia H. Liu  
 出版地點 .. Stanford, California, U.S.A.  
 出版者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時間 .. 一九九五年  
 頁數 .. 四七四頁

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特色是隨著中西文化的接觸而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如何來呈現此一

過程的複雜面貌，一直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會描寫西方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從西方衝擊論、傳統與現代化、帝國主義論，到中國中心論之出現的典範性的轉移，他強調歷史學者應「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而且盡量採取內部，而非外部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的重要性。」（註一）再者，在他之前西方學界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等人早已開始對「東方主義」（Orientalism）加以反省，認為西方人在討論東方之時，很難避免以西方的現代性作為主要的參考座標，將研究的對象放入另一個異己（other）且落後的時間與文化框架，藉此張揚現代西方的文化主體。（註二）上述兩者均批評以西方為本位的研究視角，而呼籲東方的主體性，然而在其批判性的觀點之下，中西文化如何「交融互釋」，又如何產生一個新的文化等課題，在他們的反省之中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解決。

本書作者劉禾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史，本書是由她的博士論文修改、擴大而成。（註三）她很同意上述柯文所謂「中國中心論」的研究取向，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也應採此一視角。劉禾不贊成以往從比較文學的立場，扣緊時間的先後，從事「影響」方面的研究；而主張探究「主方語言」（the host language，就本書來說是指漢語）在意義形成過程中的主動角色，這樣一來「客方語言」（the guest language）不必然是具有本質上的真實性或本身性，而完整地被搬到另一個時空脈落。反之，主方語言和客方語言是在一個複雜變動的歷史過程之中交織互動。作者也不以為在採取「中

「國中心論」來界定歷史議題之重要性（或不重要性）的同時，一定要放棄「西方中心」的考量。

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在討論二十世紀中西文化接觸之時，一方面難以放棄啟蒙時代以來的「西方」、「現代性」、「進步」等觀念，另一方面又擺脫不了將本土中國視為一個具體之物的想法（*a reified idea of indigenous China*）。（頁二七一二九）就此而言，劉禾的研究取向超越了柯文所說西力衝擊論、傳統與現代化、帝國主義論，更超越了中國中心論的新趨勢，而且不容抹殺的是她的研究取向要比中國中心論一概念所闡釋的方向要細緻得多了。（註四）

那麼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有何缺點呢？劉禾認為其視角雖有深刻的洞察力，但亦有侷限性。

（註五）她以傳教士 Arthur H. Smith 有關中國國民性之著作（*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為例說明，Smith 所描寫的中國人的國民性「發明」（*invent*）了一個中國人的整體形象，提供西方世界認識（或扭曲）中國的素材；但是當魯迅透過日文譯本（譯名為《支那人氣質》）接觸到這一本書，而這一本書又以各種方式被節譯在像《東方雜誌》之類的書刊，並進入中國人對「國民性」問題之討論時，Smith 之文本所具有的意義就不只是一個傳教士以西方觀點誤解東方（*the Orientalist gaze of the West*）的這一面向，而是具有更複雜的意涵，成為塑造歷史發展的「真實的歷史事件」（*genuine historical events*）。（頁五八一六〇）（註六）

劉禾這一本著作即希望能回應西方學界近二十、三十年來有關歷史、社會理論的反省，順著以下幾個重要的思潮來形塑其問題意識，再將之應用到中國歷史的研究之上。首先，她對語言的

重視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走向語言之途》（*Unterwegs zur Sprache*, 1959, 英譯為 *On the Way to Language*）一書中所揭示的語言與存有的關係是聯繫在一起的。（註七）換言之，語言不再被視為是反映某一主體意向的表達工具，而具有能夠建構意義的積極性格，也是存在的本體。這樣一來她不把文學作品的本身（*work itself*）當作具有存在的自主性，所以我們無法單獨地從研究文本（text）的內容來發覺其義蘊，而應注意人們認識文本的過程，此一取逕也明顯地受到詮釋學（hermeneutics）的影響。（註八）第二，她對殖民國與被殖民國在接觸過程之中所產生文化混雜性（hybridity）的探究，則是源於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 theory），上述薩依德即被歸屬於這一理論的支持者。第三，她對主體與客體之區分的反省，以及對具體「實踐」過程的強調，則與波笛爾（Pierre Bourdieu）等人的觀點不無關係。以上這些理論的內涵在此無法細論，但是從下文我對本書內容的具體的介紹，讀者則可以較清楚地了解理論實際探討與實際歷史研究工作之間的密切關係。

憑藉著以上各種理論所啟發的思考方向，作者嘗試突破以往對於近代中西文化之接觸的研究。本書的主旨扣緊「翻譯」與語言的課題，從歷史的與動態的研究取向，探討一九〇〇至一九三七年之間，中國與西方接觸之下，如何透過各種實踐，來建構一個「被翻譯的現代性」。作者企圖打破僵滯地將東與西兩者視為二元對立的想法，探討文化生產中的「共同創作權」（coauthorship，頁四六）。當然，同時她也讓我們思索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亦即不同語言之間

「翻譯」究竟是否可能免除主觀的挪用與發明？（頁二六三）（註九）

劉禾所謂的翻譯其實並不只是單純的語言轉換，而是更廣泛地注意到此一概念所喻指的意涵。正如他在書名之中所顯示的，她運用「被翻譯的現代性」一概念，來研究現代中國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特別是當代中國文學是如何形成，又如何獲得其合法地位（legitimation）。簡言之，作者的目的是探究中國的「現代」是如何經由「語言的論域」而被塑造成形。

作者將本書問題意識之焦點凝聚在「中國現代性」的課題之上乃有其特殊之用意。她認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和西方遭遇之後所產生大量的新詞彙與新知識，無一不是用來思考中國現代性的問題。對現代性問題進行思考和肯定的一個很根本的方面就是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理論」。作者所謂的現代的民族國家（modern national state）是指西方中世紀以來出現的現代國家形式，在中國，此一國家形式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打破了傳統的「天朝模型」（殷海光語）而建立的政治形式。然而在此一形式出現之前，以及此一制度之輪廓初步建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均努力於提出「民族國家理論」來推進此一進程。這使得近代中國漢語的書寫和國人對於現代國家的建構與想像之間，建立起一個「自然化」（naturalized）的聯繫。

這一主流性的「現代民族國家主義」之意識形態不僅單純地成為國人反抗帝國主義的理論依據，並且創造了一種新的有關權利的話語實踐，而滲透到二十世紀知識生產的各個層面。作者不以上述魯迅等人所提倡的「改造國民性」的例子來說明「把文學創作推向國家建設的前沿……

體現了國家民族主義對文學領域的佔領」，更把眼光放在現代文學以及與之相關的「全部文學實踐」之上：

五四以來被稱之爲「現代文學」的東西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這一文學的產生有其複雜的歷史原因。主要是由於現代文學的發展與中國進入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剛好同步，二者之間有著密切互動關係。……以往對於現代文學的研究都過於強調作家、文本或思想內容，然而，在民族國家這樣一個論述空間裏，「現代文學」這一概念還必須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學實踐納入視野，尤其是現代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建設及其運作。這些實踐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文本的生產、接受、監督和歷史評價，支配或企圖支配人們的鑑賞活動，使其服從於民族國家的意志。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文學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國家的產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國家生產主導意識形態的重要基地。（註一〇）

然而在此一實踐過程之中，民族國家論述的支配力量自然也選擇性地將與此論述無關的話語壓制下去或排除在外。

劉禾的理論聽起來似乎有些高妙難解，但是其內容卻是奠基於一些非常紮實的研究之上。其中特別值得介紹的在第一章所討論，並在附錄（頁二五九—三七八）所蒐集的從十九世紀以來，由於中文、日文與歐洲語文與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因而形成「現代漢語外來詞」。這一部份的探究與上述西方學界大約自海德格以來的「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註二)作者將附錄分為七個部分，分別追溯現代漢語外來詞的緣起，並註明中、日、歐洲語文三者之間的對照關係。在這同時作者也提醒讀者，新語詞並無一固定單一的來源，而是發明與流傳所共同形成的「具有流動意義之語源學」的產物。(頁三五)這七個部分如下：第一部份是傳教士所創造之中文用語(如空氣、民主、汽車、文學等)；第二部分是採自現代日文用漢字所翻譯的歐洲觀念(如抽象、目的、動物園等)；第三部分是採自現代日語中之漢字，而與歐洲語文無關者(如場所、集團、宗教等)；第四類是日人採用中國古典語彙來翻譯歐洲觀念，再經由文化交流而回傳中國者(如自由、司法、師範、國民、文化等)；第五類是採自現代日文之中的字首或字尾(如反革命的「反」、創造性的「性」或工業化的「化」等)而創造的新詞；第六類是以漢音翻譯英、法、德語而出現的新詞(如酒吧是bar的翻譯、夾克是jacket的翻譯)；第七類是以漢音翻譯俄文而創造的新詞(如沙文主義、拖拉機、伏特加與蘇維埃)。

作者藉著這些語詞來源的釐清，讓讀者進入一個貌似熟習，實則陌生的語言世界，這一世界也扣緊了作者所關心的文化交流與跨語際實踐的中心課題，並清楚展現新語詞的輸入與創造如何改變中國的語言，尤其是如何塑造出現代的白話文。當然讀者不一定同意「語言建構了思想」或「語言即是存有的本體」這一類較新奇的想法，然而如果我們接受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制於語言表達的話，我們可以說中國現代思想的基礎就是奠基于這些新的語詞之上。作者在本書的重要貢獻之一，即是讓讀者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此一附錄查詢近代中國重要的新語詞的來源。評者以

爲美中不足之處是作者不夠突出近代翻譯大家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年）在此過程之中的角色，尤其沒有注意到嚴譯特殊的貢獻，以及部分嚴譯被日譯取代的過程及其意義。（註二二）這也顯示，作者似乎未能充分利用她所蒐集到的豐富史料，作出更細緻的分析。

然而翻譯與語彙採借的本身並不必然導致一個新的文學或民族國家文化的出現。其中還涉及要翻譯那些作品，以及爲何要翻譯這些作品等問題。作者表示：

廣義地說，研究跨越語際的實踐是探討新的語彙、新的意義、新的論述、新的再呈現的模式等，在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接觸或衝突之中，如何興起、流傳並獲得合法性的過程。

因此意義（meanings）與其說是在觀念從客方語言傳到主方語言的過程中被轉變了，還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的本土環境之中被創造出來了。（頁二六）

劉禾所採取的「跨越語際的實踐」之研究取向在跨文化研究之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她挑戰了以往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普遍主義的觀點，認爲翻譯工作可以如實地將一個概念從甲語言轉換爲乙語言，因此翻譯之實踐就像一本雙語字典，來自不同文化的語詞之間有直接的對應關係。另一種是相對主義的觀點，認爲語言有不可翻譯性。作者嘗試在兩者之間另外走出一條路。此一方法論對於中國研究，乃至於其他第三世界，如印度、回教世界、南美國家等的文化研究，都具有啓示性的意義。

作者在本書所設置的場景是中國、日本與西方，而源於三者的文化因素相遇於翻譯之場域時，

她注意的焦點是在此過程之中一些偶然事故、相互競爭，與一些令人吃驚的扭曲，如何影響歷史的走向。（頁三二）在這一相遇之場域，中國知識分子表現出強大的創造力，他們不僅是借用與模仿西方的語彙，更積極地為了本身的目的來批判、扭曲、挪用，以及再創造西方的文學與論域，因而構造出一個新的文化。這裏所觸及的實際上已經是語言實踐的政治學。（頁八）

本書的導論是有關理論的問題，其次三個部分的八章則分別處理各個不同面向，探索如何透過語言轉換之實踐，而來建構一個以「被翻譯的現代性」為基礎的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文化。第一部份是「在民族國家與個人之間」，作者探討魯迅的改造國民性問題，以及此一問題的討論受到誰在觀察、誰被觀察，以及誰被再次表達（represented）等因素之形塑。其次則探討五四以來個人主義傳入中國的問題。第二部分處理「再表達的跨越語際的模式」（*Translingual Modes of Representation*）。此部份之下的三章，是以老舍，郁達夫、沈從文、丁玲等人之作品，未看這些作者如何引進西方的修辭語法、寫作風格與形式。作者以為以單純的影響的概念不足以認識中國文學中所呈現現代性的複雜面貌，她提出「生產性的扭曲」（productive distortion）的新視野。這樣一來許多的文本都包含了一些「隱藏的論述性的議題」。例如施蟄存（一九〇三年生，與戴望舒共同創辦《現代》雜誌）運用弗洛依德心理分析的理論不但從事有關超寫實小說的書寫，也涉及傳統小說中「志怪」傳統的現代演變。（頁一三六—一三七）第三部分是「國族建構與文化建構」，作者探討在民族國家主流論述之外，女性作家有其自身之關懷點。經由文學大系之編寫所

建立之寫作規範，以及有關誰能合法地來界定中國文學之論辯，導致作者最後的一個問題，亦即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文化」為何成爲民族國家與人們展現其特殊性的標誌，他們又如何實現此一想法。以下我將較詳細地介紹書中的第三、七、八三章的內容。

作者在第二章對於「個人主義」論述的分析足以顯示她的企圖。她所討論的主題是西方個人主義話語在構成中國「民族國家」概念的過程中所受到的推動與抵制。他首先批評許多研究者對五四運動一種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理解，傾向於將東方／西方、個人／國家相對立看待。（註一三）他主張回歸到歷史過程之中，探索外來觀念的移植如何取決於本土話語操弄者的選擇，而此一選擇的基礎是本土政治權力運作之基礎的傳統話語結構。

作者指出雖然在當時中國固有語彙之中不乏有關自我的詞彙，如自我、我、己等等，然而「個人主義」是從明治時代之日本所借來的一個新語詞。當代中國學術界對於個人主義問題的爭論顯示此一概念與固有情境之間的格格不入。然而作者並不企圖去掌握個人主義在本質上的意義，她反而去追溯在民國初年的論辯之中，此一語彙所經歷的過程，並提供個人主義論述形成之語源學。

第七章是作為合法性論域之文學批評。作者企圖顯示她所說民族國家主義對文學批評的滲透力，討論「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實踐與民族國家文學的關係」。她以蕭紅的《生死場》和現代文學的批評體制，以及權威的文學史寫作之間的關係，來探討民族國家文學生產的過程。作者指出《生死場》是蕭紅的成名作，這一部小說描寫九一八事變前後東北鄉村的生活，其中女性的命運是小

說的一個重點。此篇小說發表之後，關於該文的解釋與評價就一直受到民族國家話語的宰制。然而作者認為此一「男性的」、「民族國家主義的」解讀（如魯迅與胡風的評論）有重大的盲點，因為對蕭紅來說，生與死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個人的身體，特別是女性的身體之上，而不僅僅在民族興亡。作者強調女性的身體不僅是生與死的場所，而且還是小說獲得其內涵和意義的來源。然而歷來的男性文學批評家都企圖講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因而無視於蕭紅對民族國家論述的複雜情感，更抹殺了她對主流話語的顛覆。這一現象展現出蕭紅與民族國家主義與父權傳統之間的矛盾，也揭示現代文學批評參與民族國家文學生產的歷史過程。（頁一九九—二二三）（註一四）

作者在第八章探討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的一位年輕編者趙家璧在一九三〇年代如何創造、出版十卷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良友公司以出版《良友畫報》聞名，一九三二年趙家璧加入良友，從事編輯工作。一九三四年趙家璧向公司提出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構想，此書的靈感是來自日文出版品之中類似的著作，而「大系」二字也是直接採自日文的漢字。良友的老闆伍聯德接受此一企劃，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從編輯、印刷到成書總共花費的時間不到兩年。（頁二二七）

在本章作者探究的幾個根本問題包括：該書的編輯與當時政治環境的關係為何（如國民政府打擊左翼文人、發動新生活運動等）？在編輯的過程之中編者如何構思何謂「文學」？如何作時間斷限？又如何以此一標準從事分類與選文？再者此一分類與國外之分類有何關係？當然此一創

造出來的文學大系自然也排除掉與編者標準不同的作者、文類與作品。極有趣的是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之後，趙家璧在蔡元培的鼓勵下，又企劃編輯一套十本的《世界短篇小說大系》，企圖反映各國的文學及其對中國作家的影響，可惜受到日本佔領上海的影響而作罷。（頁二三七）作者有關現代文學大系出版故事的描寫與分析顯示她在歷史與文學批評兩方面的才幹。這一角度所勾勒出文學史編寫所身處的文化脈絡，包括政治社會經濟背景、人際關係、思想因素等，共同地構築出文本之外一幅生動活潑的歷史圖像，這一細緻的處理手法是以往學者所忽略的。

就管見所及，在中國研究之中，只有很少數的著作從翻譯的角度來探討近代中國國家文化的形成。（註一五）本書無論在理論探索的深度與材料運用的廣度兩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研究。它不是有關比較文學，也與文化史，以及理論反省有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作者所從事的是一個國際整合的工作，包括文學批評、文獻分析、語言學、語言哲學和歷史研究等。這樣的工作如果不對東西語文、歷史、文化有深度掌握的話，是無法從事的。

劉禾女士的這一本大著讓讀者對於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作一個重新的思索，也激勵學者們針對該書所揭示的一些重要議題，如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中國的現代性、東西文化的接觸，與比較文學等方面，再做進一步的研究。

註一：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86.

註二：特別是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余英時強調薩依德所說的「東方」主要是指中東的伊斯蘭教世界，並不包括中國，而且他雖然主張阿拉伯世界各族群建立血緣的文化認同，以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但是他也並不採取狹隘的部落觀點，認為應該排斥一切「非我族類」的文化。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頁一一一—一二。有關薩依德生平與思想的簡要敘述，可參考單德興在他所翻譯薩依德著《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書中的緒論。

註三：她的博士論文是 "The Politics of First-Person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註四：對柯文「中國中心論」的反省與批判亦可參見 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22:3 (1996), pp.243-284.

註五：作者顯然一方面深受薩依德「東方主義」論的啟發，另一方面也企圖超越薩依德的成就。一九九一年四月底本書作者即與舊金山州立大學歷史系的 Tani E. Barlow 教授合作召開「『東方主義』之後：全球文化批評中的東亞」研討會，反省東方主義，並從歷史的層面開拓歐美霸權殖民東亞的研究。會中決定一九九三年春季開始成立一個東亞文化批判

理論的刊物《位置》（*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s*），一年出版二期，目前該刊物已成爲東亞文化批判的重要期刊。有關該次會議的報導請參見鄒羽：〈理論與歷史・柏克萊「『東方主義』之後全球文化批評中的東亞」研討會述評〉，《今天》，一九九二年三月，頁114-119。Tani E. Barlow 會將《位置》一刊中的重要文章編成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一書，嘗試以「殖民地的現代性」作為全書的主題，書中也收錄了劉禾的文章。

註 六：作者很同意 James Hevia 的觀點認爲傳教士的書寫與其說是被動地反映歷史事實，還不如說企圖或實際上塑造了歷史事實，也塑造了後代人們對歷史事實的認知。（頁五八）見 James Hevia, "Leaving a Brand in China: Missionary Discourse in the Wake of the Boxer Movement," *Modern China* 18:3 (1992), pp.304-332. 此外關於東方主義與中國研究也可以參看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1996), pp.96-118.

註 七：此書有中譯本，孫周興譯，〈走向詮釋之途〉（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亦可參考余德慧：《詮釋現象心理學》（臺北：會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一書中對海德格理論的介紹。

註 八：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註 九：這是語言學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所反覆探究的課題，例如英文的 frog 可否翻譯爲中文的青蛙？表面上看來 frog 與青蛙均對應到一種綠色、四腳，又會跳的小動物，然而英文 frog 一語背後所有的文化意涵卻與青蛙一語在中文世界所有的文化意涵有所不同。這樣一來比較悲觀的人會認爲不同語言之間的意義轉換最後是不可能的。

註一〇：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生死場》的啓示〉，收入唐小兵編：《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111。

註11：有關此一轉向及其對思想史、社會與文化研究的衝擊有不少的討論，例如 John E.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4 (1987), pp.879-907. Richard M. Rorty,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註11：作者在本書的頁115、115、八七三處提到嚴復，但只是點到為止，沒有深入分析。熊月之會談到嚴譯新詞的歷史命運，他指出嚴復苦思冥想所鑄造的新詞除了「物競」、「天擇」、「邏輯」等為後人所沿用之外，大多數都競爭不過日本轉譯來的新名詞，如計學（經濟學）、群學（社會學）、內籀（歸納）、版克（銀行）等，他並指出商務印書館在嚴譯八種之後所附的「中西譯名表」，共收四八二條，其中被學界所沿用的僅 56 條（其中還包括嚴復沿用以前的翻譯如「歌白尼」與「美利堅」等）。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七〇一—七〇一。

註13：在這方面作者顯然同意薩依德的反本質(anti-essentialist)論，反對文化純粹論、批評東西二分法之不當、認同是被建構出來的等觀點。

註14：孟悅與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一書也深入分析女性與民族主體的矛盾關係。

註一五：拙著是有關此一主題的另外一個例子，見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在這一本書之中我以文本對照的方式分析嚴復如何將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 *On Liberty* 譯為《群己權界論》，他的翻譯其實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並與他對中國未來的思索密切相關。

(翻訳)書評: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黃 克 武 著  
中里見 敬 訳

Review: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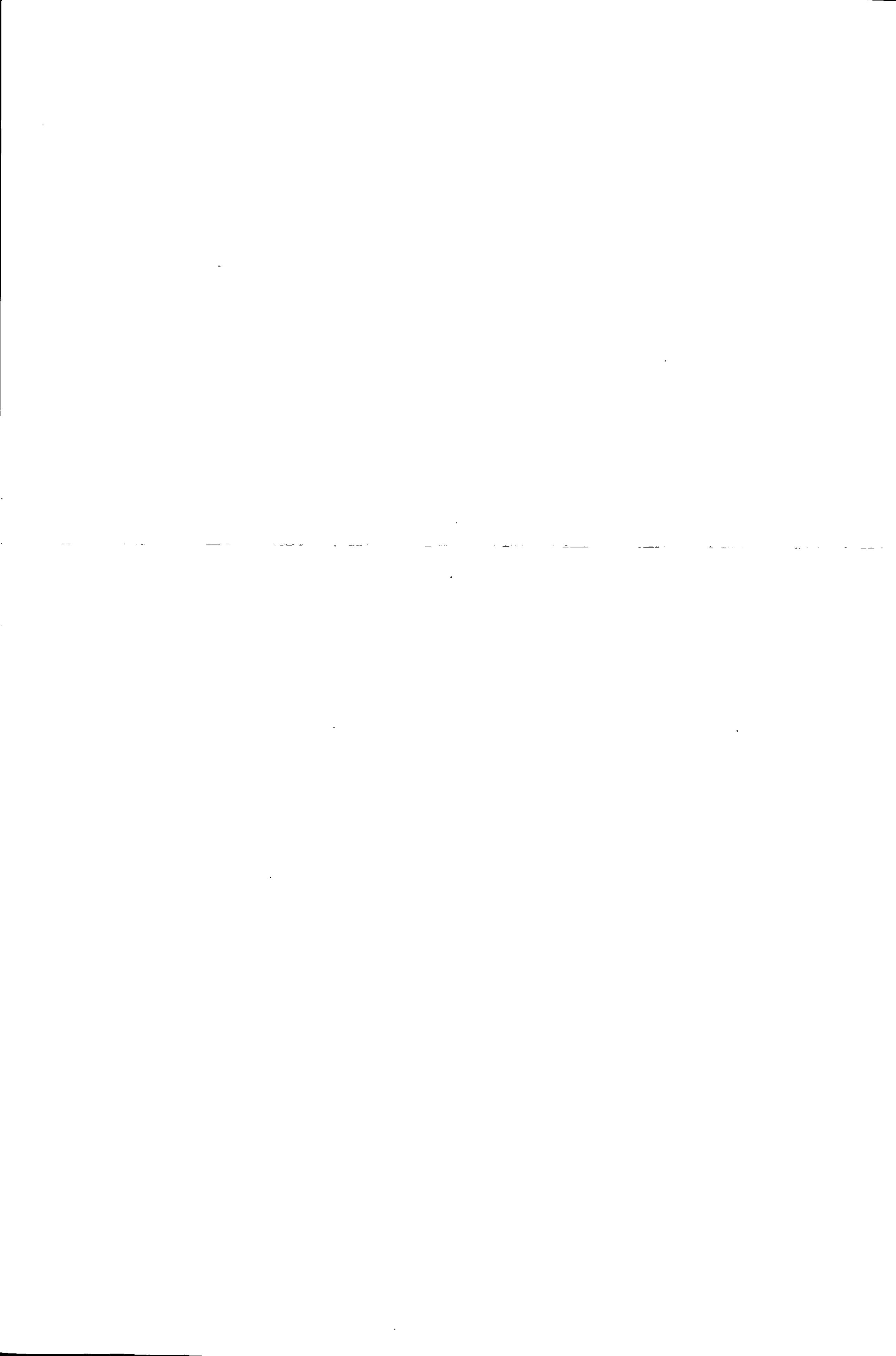
Max K. W. Huang  
Translated by Satoshi Nakazatomi

言 語 科 學

第 38 号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言語研究会

2003



**書評：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黄克武 著，中里見敬 訳

**【解題】**

本訳稿は、黄克武評《劉禾著〈跨越語際的實踐：一九〇〇至一九三七年間中國的文學、民族國家文化與被翻譯的現代性〉》（《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5，臺北：國史館，2000）を翻訳したものである。

評者の黄克武（Max K. W. Huang）氏は、国立台湾師範大学、オックスフォード大学でそれぞれ修士号を取得したのち、2001年には博士論文 "In Search of Wealth, Power, and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によりスタンフォード大学歴史学科から博士学位を授与されている。現在、台湾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の任にある気鋭の学者である。

黄克武氏の主要著書としては、《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および本文の注15にも掲出されている《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がある。また編著として、黄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があるほか、《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7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の聞き取り調査にも参加している。さらに、近刊の Joshu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 には論文 "Liang Qichao and Immanuel Kant" を寄稿している。

本書評には、黄克武氏の中国近代思想史家としての本領だけでなく、批評理論や文学・文化研究に対する深い理解と関心も示されている。そのため本書評は周到なレビュー論文であるだけでなく、多様な領域にまたがる原著の意義を解説した絶好の紹介ともなっている。また本書評は、近代中国のみならず、日本・韓国・台湾など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民国家・国民意識の成立に関心をもつ読者に対して、原著の成果を紹介し、有意義な啓発を含む内容となっている。ややもすれば日本研究・中国研究・韓国研究が分断されたまま視野を閉ざしがちな日本の学界の現状に照らして、本書評が東アジアというパースペクティブで当該の問題群を考えるきっかけになることを期待したい。

なお、原著および原著者については、以下の日本語訳を参照いただきたい。

リディア・リュウ著、宮川康子訳「言語横断的実践・序説(上)(下)」(『思想』899, 900, 東京：岩波書店, 1999-5, 6)

リディア・リウ著、中里見敬訳「ホモ・エコノミクスと小説的リアリズムの問題」(『言語文化論究』13, 福岡：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 2001)

リディア・リウ著、中里見敬訳「『中国新文学大系』の成立」(『言語科学』36, 福岡：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言語研究会, 2001)

リディア・リウ著、中里見敬・清水賢一郎訳「文化と国粹を再考する」(『言語文化論究』14, 福岡：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 2001)

原著の中国語訳は従来の部分訳とは異なる、附録も含めた全訳版が最近刊行された。

劉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原著に対する英語による書評には以下のものがある。掲載誌および評者名を記す。

*China Information*, vol. XI, no. 1 (Summer 1996), pp. 139-145. Rev. by Michel Hockx.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v. 1996), pp. 989-990. Rev. by Wendy Lars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49 (Summer 1997), pp. 283-285. Rev. by Wang Ban.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 48, no. 3 (July 1998), pp. 524-529. Rev. by Viren Murth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8, no. 2 (Dec. 1998), pp. 568-580. Rev. by Theodore Hu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61, part 1 (1998), pp. 182-183. Rev. by Daruvala S. F.

(以上、中里見記)

近代中国の重要な特色の一つは、東西文化の接触にともなって一連の変化がもたらされたことであり、その過程の複雑な様相がどのようにして出現したかという問題は、貫して中国近代史研究の重要な課題であった。アメリカの学者ポール・コーベンは、西洋の中国近代史に関する研究モデルの変遷——西洋の衝撃論、伝統と近代性、帝国主義論から、中国自身に即したアプローチが現れるまで——を描写して、歴史学者は「中国の歴史を西洋から説き起こすのではなく、中国みずからのうちに始まるものと捉え、中国の歴史においてなにが重要かを決定するのに、可能なかぎり、外在的（西洋の）基準ではなく、内在的（中国の）基準を用い」るべきだと強調している<sup>\*1</sup>。またコーベン以前に、西洋の学界ではサイードのような人たちが、すでにオリエンタリズム（Orientalism）に対する反省を開始していた。西洋人が東洋を論じるとき、西洋の近代性を主要な参照軸として、研究対象を異なる他者（other）に、しかも後れた時間的・文化的枠組みの中に放逐し、そ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近代西洋の文化的主体を称揚することから免れえなかった、と考えるのである<sup>\*2</sup>。コーベンとサイードの両者はともに西洋を中心とした研究姿勢を批判し、東洋の主体性を主張する。しかし、こうした批判的観点のもとで、中国と西洋の文化がいかに「互いに融合しあい解釈しあう」のか、またいかにして新たな文化を生み出していくのかといった課題は、彼らの反省の中でいまだ十全な解決をみていない。

本書の著者リディア・リウ（劉禾）はアメリカのハーバード大学の博士で、現在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バークリー校比較文学学科で教鞭をとっている【訳者補：2001年よりミシガン大学アジア言語文化学科兼比較文学プログラム教授】。主な研究分野は中国近代

文学史・文化史であり、本書は彼女の博士論文を修正し、拡充したものである<sup>\*3</sup>。著者はコーベンのいわゆる「中国自身に即したアプローチ」の研究方法に賛同し、中国近代文学の研究もこうした観点を採用すべきだと考える。一方、時間の前後関係に密着して「影響」の研究を行う従来の比較文学の立場には賛成せず、「主言語」(the host language, 本書では中国語を指す)が意味形成過程ではたゞ積極的な役割を探求すべきことを主張する。そのように考えると、「客言語」(the guest language)は必ずしも本質的な真実性や<sup>オーセンティシティ</sup>正しさを備えたものではなく、またそのまま異なる時間的・空間的コンテクストに移しかえられるものとは限らなくなる。むしろ、主言語と客言語は、複雑に変動する歴史過程の中で互いに入り交じりあうものなのである。「中国自身に即したアプローチ」を採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歴史的問題の重要性（あるいは非重要性）に境界線を引くことは、必ずしも同時に「西洋中心」的な考慮を放棄することになるとは限らないと著者は考える。二十世紀の中国と西洋の文化接触を議論するとき、我々は一方で「西洋」、「近代化」、「進歩」といった啓蒙時代以来の観念を放棄することができず、他方ではまた中国本土を一つの固有なものと見る考え方(a reified idea of indigenous China)から自由になれ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に問題のカギはある(pp. 27-29)。この点についていえば、著者の研究方法は、コーベンのいう西洋の衝撃論、伝統と近代化、帝国主義論を乗り越えており、また中国自身に即したアプローチという新しい趨勢をも凌駕している。しかも見逃してならないのは、著者の研究方法は中国自身に即したアプローチという概念によって示されたやり方よりもはるかに精緻であることだ<sup>\*4</sup>。

それでは、サイード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はどのような欠点を持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著者は、その見方は深い洞察力を有しているけれども、限界もあると考える<sup>\*5</sup>。著者は宣教師アーサー・スミス(Arthur H. Smith)の中国人の国民性に関する著作(*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を例に、スミスの描いた中国人の国民性が、中国人という全体的な形象を「創出=捏造」(invent)し、西洋世界に中国を認識する（あるいは歪曲する）素材を提供した、と説明する。しかし、魯迅が日本語訳(『支那人氣質』)を通してこの本に触れ、またこの本が様々な方式で『東方雑誌』のような雑誌に抄訳掲載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人が「国民性」の問題を議論するようになると、スミスのテクストがもつ意味はたんに一人の宣教師が西洋の眼差しで東洋を誤解した(the Orientalist gaze of the West)ということにとどまらず、歴史の発展を作り出す「真に歴史的な出来事」(genuine historical events)となつたのである(pp. 58-60)<sup>\*6</sup>。

リウのこの著作は、西洋の学界におけるここ二、三十年來の歴史・社会理論をめぐる反省に呼応して、以下のいくつかの重要な思潮に沿って問題意識を形成し、さらにそれを中国の歴史研究に応用することを意図している。まず第一に、著者がことばを重視するのは、ハイデッガー『言葉への途上』(*Unterwegs zur Sprache*, 1959, 英訳は *On*

*the Way to Language*)に示されたことばと実存の関係と切り離せないものである\*7。言い換えると、ことばはもはやある主体の意図を反映する伝達の道具と見なされるのではなくて、意味を構築することのできる積極的な性格を有し、また存在の実体となる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にして、著者は文学作品それ自体(*work itself*)を存在の自立性を有したものとは見なさず、したがって我々はテクストの内容を研究するだけではその含意を明らかにしえず、人々がテクストを認識する過程に注意を向けねばならなくなる。こうした切り込み方は明らかに解釈学(hermeneutics)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る\*8。第二に、著者が植民国家と非植民国家の接触過程において生まれた文化の混濁性(hybridity)を探究するのは、ポストコロニアル理論(post-colonial theory)に基づいている。上述のサイードはこの理論の支持者である。第三に、著者が主体と客体を区別することを反省し、また具体的な「実践」過程を強調するのは、ピエール・ブルデュー(Pierre Bourdieu)らの観点と無縁ではない。こうした理論の内容についてここで立ち入って論じ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本書の内容に対する以下の具体的な紹介をとおして、読者には理論的研究と実際の歴史研究の間の密接な関係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ができるかと思う。

以上のような様々な理論によって啓発された思考の方向性に基づいて、著者は近代における中国と西洋の文化接触に関する従来の研究を乗り越えようとする。本書の主旨は、「翻訳」と言語の問題に密着しながら、歴史的かつ動態的な研究方法によって、1900年から1937年までの中国と西洋の接触のもとで、様々な実践をとおして、いかにして「翻訳された近代性」が構築されたかを探ろ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東洋と西洋の両者を二項対立と見なす硬直した考え方を打ち破るために、著者は文化生産における「共同創作権」(coauthorship, p. 46)を考える。もちろん、我々は同時により根本的な問題——すなわち異なる言語間の「翻訳」ははたして主観的な流用や創出=捏造から免れうるのか——を思索するよう促される(p. 263)\*9。

著者のいう翻訳とは、実はたんなる言語の変換だけではなく、翻訳という概念が指示する含意により広く目を配ろ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著者が書名の中で示しているように、「翻訳された近代性」という概念を用いて、近代中国の国民文化(national culture)、とりわけ近代の中国文学がどのように形成され、またどのようにして正統性(legitimation)を獲得したのかを研究しようとする。簡潔にいえば、著者のねらいは、「ことばという言説」を経由して、中国の「近代」がどのようにして形づくられたかを考えることにある。

著者が「中国の近代性」という問題に本書の問題意識を焦点化しているのには、特別な意図がある。二十世紀における中国と西洋の出会いののち、大量に生まれた新しい語彙と知は、どれも中国の近代性という問題を考えるのに格好の材料だと著者は考える。近代性の問題を考え、近代化を肯定するためには、近代的な「国民国家理論」

を作りあげることが根本的に重要であった。著者のいう近代国民国家(modern national state)とは、中世以降の西洋で出現した近代的な国家形態であり、中国ではこうした国家形態は辛亥革命後、伝統的な「天朝モデル」(殷海光の用語)を打破して作られた政治形態である。しかし、その形態が出現する以前、およびその制度の初步的輪郭が作られて以後、中国の知識人は「国民国家理論」を提起して、そのプロセスを推進しようと努めた。それによって、近代中国における中国語エクリチュールと、中国人による近代国家の構築と想像との間に、「自然な」(naturalized)つながりが作りあげられたのである。

こうした「近代国民国家主義」の中心的イデオロギーは、たんに中国人が帝国主義に抵抗する際の理論的根拠となっただけではなく、権力に関する新たな言説実践を創造し、二十世紀における知の生産のあらゆるレベルに浸透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著者は、上述した魯迅らによって提唱された「国民性改造」の例をあげて、「文学創作が国家建設の前線へと押しだされ、……国家国民主義が文学の領域を占領したことを表している」と説明するだけでなく、さらに近代文学およびそれと関連する「すべての文学実践」へと視野を広げて、次のようにいう。

五四以来、「近代文学」と呼ばれているものは、実は国民国家文学の一種である。こうした文学が生まれるには、複雑な歴史的原因があった。主として、近代文学の発展と中国が近代国民国家に入っていく過程とがちょうど重なったために、両者の間には密接な相互関係があるのだ。……従来の近代文学研究は作家、テクスト、あるいは思想内容を過度に強調すぎていた。しかし、国民国家という言説空間においては、「近代文学」という概念は作家やテクスト以外のすべての文学実践——とりわけ近代における文学批評・文学理論および文学史の構築と活用——を視野に入れる必要がある。こうした実践が、直接または間接に、テクストの生産・受容・監督・歴史的評価をコントロールし、支配者たちの鑑賞活動を支配したり方向づけることによって、近代文学を国民国家の意志に服従させるのである。その意味で、近代文学は国民国家の產物であると同時に、一方では、国民国家のために主導的イデオロギーを作り出す重要な基地でもあるのだ。<sup>\*10</sup>

しかし、こうした実践過程において、国民国家言説の支配力がそれと関係のない言説を選択的に抑圧したり、排除したりするのは自然のなりゆきであった。

リウの理論は高尚で難解に聞こ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れども、その内容はきわめて着実な研究に基礎を置いている。なかでも特に紹介しておく価値があるのは、第一章の議論、および附録(pp. 259-378)に収集されている十九世紀以来の中国語・日本語とヨーロッパの言語および文化の相互交流によって生まれた「近代中国語の外来語」であ

る。これらの部分における探求は、上述したおおむねハイデッガー以来の西洋の学界における「言語論的転回」(linguistic turn)と不可分の関係にある\*11。著者は附録を七つの部分に分けて、近代中国語の外来語の由来をさかのぼり、中・日・ヨーロッパ語の三者の対照関係を注記している。それと同時に著者は、新語には固定した单一の起源があるのではなくて、創出=捏造と流通によって共同で形成された「意味の変容する語源学」の産物であることにも、読者の注意を喚起している(p. 35)。その七つの部分と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第一類は、宣教師によって作られた中国語の用語（「空気」、「民主」、「汽車」、「文学」など）。第二類は、近代日本語によって翻訳されたヨーロッパの観念を採用したもの（「抽象」、「目的」、「動物園」など）。第三類は、近代日本語の中の漢字語で、ヨーロッパの言語とは関係のないもの（「場所」、「集團」、「宗教」など）。第四類は、日本人が中国の古典語彙を用いてヨーロッパの観念を翻訳し、それが文化交流を経て中国に還流してきたもの（「自由」、「司法」、「師範」、「国民」、「文化」など）。第五類は、近代日本語における接頭語や接尾語（反革命の「反」、創造性の「性」、工業化の「化」など）を採用して作られた新語。第六類は、漢音によって英・仏・独語を音訳して生まれた新語（「酒吧」は bar の、「夾克」は jacket の音訳であるような例）。第七類は、漢音によってロシア語を翻訳して作られた新語（「沙文主義」（ショービニズム）、「拖拉機」（トラクター）、「伏特加」（ウォッカ）、「蘇維埃」（ソビエト）など）。

著者はこうした語の由来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熟知しているようで実はよく知らなかつたことばの世界へと読者を導く。その世界はまた、文化交流と言語横断的実践という著者の中心的課題と密着しており、また新語の輸入と創造によって、中国の言語がいかに変化したか、とりわけ現代の白話文【訳者補：中国語の言文一致文体。1917 年の胡適らによって始まった文学革命・白話文運動以降、それまでの文言文（文語体、いわゆる漢文）に代わる書きことばの文体として定着した】はいかに作りあげられたかを明瞭に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もちろん読者は、「言語が思想を構築する」とか「言語は存在の実体である」といったたぐいの、やや新奇な考え方には必ずしも同意する必要はない。しかし、もし我々が思想は相当程度に言語表現によって制限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を受け入れるならば、中国近代思想の基礎はこうした新しい語の上に築か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本書における著者の重要な貢献の一つは、この附録を利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近代中国の重要な新語の由来を非常に便利なかたちで調べることを可能にした点にある。評者が物足りなく思うのは、近代翻訳の大家である嚴復(1854-1921)がこの過程で果たした役割が十分に強調されておらず、なかでも嚴復訳の特殊な貢献、および嚴復訳の一部分が日本語訳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た過程とそのことの意味について注意が払われていないことである\*12。このことは、著者には自らの収集した豊富な史料をさらに存分に利用して、いっそう精緻な分析を展開する余地の

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よう。

しかし、翻訳および語彙の借用それ自体は、新たな文学あるいは国民国家文化の出現を必然的にもたらすわけではない。なかでもどの作品を翻訳するのか、またなぜその作品を翻訳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かといった問題がかかわってくる。著者は次のようにいう。

広く定義すれば、言語横断的実践の研究とは、客言語との接触／衝突によって、あるいは客言語との接触／衝突にもかかわらず、主言語の中で、新たな語・意味・言説・表象のモードが生まれ、流通し、<sup>レジティメーション</sup>正統性を獲得する過程を探ることである。したがって、ある概念が客言語から主言語へと伝わる過程で、意味(meanings)が「変換」された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主言語のローカルな環境の中で、意味が創出=捏造されたというべきである。(p. 26)

リウが採用する「言語横断的実践」という研究方法は、文化横断的研究にとって特別な意味をもつ。著者は従来の二つの異なる観点に挑戦している。一つは普遍主義的な観点である。この見方によれば、翻訳という仕事はある概念をありのままにA語からB語へと変換できる。したがって、翻訳の実践は二か国語辞書のように、異なる文化に由来することばを直接的な対応関係で結ぶ。もう一つは相対主義的な観点で、ことばには翻訳不可能性があると考える。著者はこの二つとは違う道を歩もうと試みている。こうした方法論は、中国研究に対して、またインド・イスラム世界・ラテンアメリカ諸国など、第三世界の文化研究に対して、啓示的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である。

著者が本書で設定した場は、中国・日本と西洋である。そして、三者に由来する文化的要素が翻訳という場で対面(confrontation)したとき、その過程で起こった偶然の出来事や相互の競争、また驚くべき歪曲が、いかに歴史のゆくえに影響を与えたかという点に、著者の関心の焦点はある(p. 32)。こうした対面の場において、中国の知識人は大きな創造力を發揮した。彼らは西洋の語彙を借用し模倣しただけでなく、自らの目的のためにより積極的に批判・歪曲・流用し、また西洋の文学と言説を再創造して、新たな文化を作り出したのである。ここで触れられているのはもはや事実上、言語実践の政治学(politics)である(p. 8)。

本書の序論では、理論に関する問題が論じられている。続く三部に分けられた八つの章では、それぞれ異なる諸側面が取り上げられ、言語転換の実践をとおして、「翻訳された近代性」を基盤とした近代中国の国民国家文化がいかにして構築されたかが追究される。第一部「国民と個人のはざまで」において、著者は魯迅の国民性改造問題を検討し、この問題をめぐる議論は、誰が観察し、誰が観察され、そして誰が表象(represented)されているのかといった要素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ていると論じる。ついで

五四以後、個人主義が中国に伝えられた問題を検討する。第二部では「表象の言語横断的モード」(translingual modes of representation)が取り扱われる。この三章では、老舍・郁達夫・沈從文・丁玲らの作品によって、これらの作者がどのようにして西洋の修辞法や創作のスタイルと形式を取り入れたかを論じる。著者は影響という単純な概念では、中国文学に表れた近代性の複雑な様相を把握するには十分でないと考え、「生産的歪曲」(productive distortion)という新しい視点を提起する。こうして、多くのテクストが「隠された言説的問題」を内包することになる。例えば、施蟄存(1903年生まれ。戴望舒とともに雑誌『現代』を創刊した)はフロイトの精神分析理論を用いて、シュールリアリズム小説の創作に従事しただけでなく、古典小説における「志怪」の伝統を現代に生まれ変わらせることにも関わっているのだ(pp. 136-137)。第三部「国民創出と文化建設」では、著者は国民国家の中心的言説を検討するだけでなく、女性作家には女性自身の関心があったことをも論じている。文学大系の編纂によって作りあげられた創作規範、および誰が中国文学を正統に定義しうるのかをめぐる議論を経て、著者の最後の問題が導き出される。すなわち、中国の知識人にとつてどうして「文化」が、国民国家および中国人の特殊性を表す指標となったのか、彼らはいかにしてこのような考え方を身につけたのかという問題である。以下、第三、七、八章の内容をやや詳しく紹介しよう。

第三章における「個人主義」言説に対する分析は、著者の意図を余すところなく示している。著者が論じるテーマは、中国で「国民国家」概念が構築される過程において、西洋の個人主義という言説がどのように推称され、また排斥されたかという問題だ。著者はまず、五四運動に対する多くの研究者の理解が本質主義的(essentialism)であること、東洋／西洋、個人／国家を対立的にとら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を批判する\*13。著者は歴史の過程に立ち戻ることを主張し、外来概念の移植がいかに現地語話者の選択により決定され、しかもその選択の基準がいかに現地の政治権力作用の基盤である伝統的言説構造に依拠しているかを考察する。

当時、中国固有の語彙の中に「自我」、「我」、「己」など個人に関わることばが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個人主義」という新語が明治日本から借用されたことを著者は指摘する。現在の中国の学術界における個人主義問題に関する論争は、この概念と中国固有の情況との間に相容れないものがあることはっきりと示している。しかし、著者は個人主義を本質的な意味で把握しようするのではなく、民国初期の議論の中でこの語彙が経てきた過程にさかのぼって、個人主義言説が形成される語源学を提示しようとするのである。

第七章は「正統的言説としての文学批評」である。著者は国民国家主義の文学批評に対する浸透力を示すために、「中国近代文学の批評実践と国民国家文学との関係」を議論する。著者は蕭紅の『生死場』と近代文学の批評機制、および權威ある大家に

よる文学史執筆の関係をとおして、国民国家文学の生産過程を検討する。『生死場』は蕭紅の出世作であり、この小説は九・一八事変【訳者補：満洲事変、柳条湖事件】前後の東北農村の生活を描いており、その中の女性の運命が小説の一つの重点であることを指摘する。この小説の発表後、その解釈と評価はたえず国民国家言説の支配を受けてきた。しかし、著者によれば、こうした「男性的」、「国民国家主義的」な読解（魯迅や胡風の評論のような）には重大な盲点がある。なぜなら蕭紅にとって、生と死の意味はまず何よりも個人の身体に、とりわけ女性の身体の上に体現されるのであって、たんに民族の興亡だけに関わるものではないからだ。女性の身体は生と死の場であるだけでなく、この小説が内実と意味を獲得する根源でもあることを著者は強調する。しかし、従来の男性文学批評家たちは、蕭紅の国民国家言説に対する複雑な感情を無視し、さらに彼女が中心的言説を転覆したことを抹殺して、まったく別の物語を語ろうとしてき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た現象は、蕭紅と国民国家主義および家父長的伝統の間の矛盾を示しており、また近代文学批評が国民国家文学の生産に関する歴史的プロセスをも示している(pp. 199-213)\*14。

第八章において著者は、上海の良友図書公司の若き編集者・趙家璧が一九三〇年代にどのようにして十巻の『中国新文学大系』を作りあげ、出版したかを論じている。一九三二年、趙家璧は『良友画報』の出版で有名だった良友公司に入社し、編集の仕事に携わる。一九三四年、趙家璧は『中国新文学大系』の構想を会社に提案する。この企画は、日本語出版物の中の類似の著作からヒントを得たもので、「大系」の二字も日本語の漢字から直接採用されたものだった。良友の社長・伍聯德がこの企画にゴーサインを出してから、一九三六年二月の『中国新文学大系』完結に至るまで、編纂、印刷から刊行までのすべてにかかった時間はわずか二年足らずであった(p. 227)。

本章における著者の考察は、いくつかの根本的な問題を含んでいる。該書の編纂と当時の政治情勢の関係はどうであったか（国民政府による左翼文人の弾圧、新生活運動の発動など）。編纂の過程で、編集者は「文学」とは何かについてどのように構想したのか。時代区分はどのように行われたのか。どのような基準によって分類し、文章の選択を行ったのか。さらにこうした分類は国外の分類とどのような関係があるのか。もちろんこうして作り出された文学大系は、編集者の基準に合わない作者・ジャンル・作品を排除することになる。大変興味深いことには、『中国新文学大系』の出版後、趙家璧は蔡元培の激励のもと、一セット十冊からなる『世界短篇小説大系』の編纂を企画し、各国の文学およびその中国の作家に対する影響を反映したものにする予定であった。ところが、残念なことに日本の上海占領によって中止となった(p. 237)。近代文学大系出版の物語に関する描写と分析は、著者の歴史および文学批評の両面における才能を示している。こうした角度から書き出すことによって、テクストの外部にある文学史編纂の置かれた文化的コンテキスト——政治・社会・経済的背

景、人間関係、思想的要素などを含む——が総動員されて、生き生きとしたダイナミックな歴史的イメージが構築さ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な精緻な手法は、これまでの研究者に見られないものである。

管見のおよぶ限り、中国研究において、翻訳という観点から近代中国の国民文化の形成を論じた著作はきわめて少ない<sup>\*15</sup>。本書は理論的探究の深さと資料運用の広さの両面で、いずれも従来の研究を凌駕するものである。また本書は比較文学だけでなく、文化史および理論の再考とも密接な関係を有している。著者が行っているのは、文学批評・テクスト分析・言語学・言語哲学・歴史研究などを含む、領域横断的な学際研究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だろう。こうした研究は、東西の言語文学・歴史・文化に対する深い理解がなければ、到底なしえないものである。

リウ氏の大著は、読者に近代中国の文学と文化に対する新たな思索を促すとともに、本書で示された重要な問題——文化横断的な比較研究・中国の近代性・東西文化の接触・比較文学など——に対する研究をいっそう進展させるよう、研究者を鼓舞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 注

\*1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86.【日本語訳：ポール A. コーエン著、佐藤慎一訳『知の帝国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東京：平凡社、1988）p. 266。引用は佐藤訳によるが、一部、訳者（中里見）が改変した箇所がある。】【中国語訳：柯保安著、李榮泰等譯《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臺北：聯經出版，1991）。】

\*2 特に、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日本語訳：エドワード・W. サイード著、今沢紀子訳『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平凡社、1986；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1993; 1995）。】【中国語訳：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余英時は次の二点を強調する。サイードのいう「東洋」は主に中東のイスラム教世界を指し、中国を含んでいない。またアラブ世界の各民族は自己の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作りあげ、それによって西洋帝国主義の文化的霸権に抵抗しているとサイードは主張するけれども、彼は狭い部族的観点は採らず、また「他者」の文化はすべて排斥すべきだとも考えない。余英時《歴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pp. 12-13。サイードの経歴と思想についての簡潔な紹介は、薩依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の訳者による緒論を参照。【日本語訳：エドワード・W. サイード著、大橋洋一訳『知識人とは何か』（東京：平凡社、1995；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1998）。日本語訳の訳者あとがきにもサイードの簡潔な紹介がある。】

\*3 著者の博士論文は、"The Politics of First-Person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Harvard

- University, 1990 である。
- \*4 コーエンの「中国自身に即したアプローチ」に対する反省と批判に関しては以下も参照。  
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22: 3 (1996), pp. 243-284.
- \*5 著者はサイード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論の啓発を深く受けると同時に、サイードの成果を乗り越えようと企てている。1992 年 4 月末、本書の著者とサンフランシスコ州立大学歴史学科の Tani E. Barlow 教授【訳者補：1994 年よりワシントン大学歴史学科兼女性学科教授】は、「『オリエンタリズム』以後：グローバルな文化批評の中での東アジア」という学会を共同で開催し、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を反省するとともに、歴史レベルからの欧米霸権による東アジア植民地化研究を開拓した。学会は 1993 年春に東アジア文化批評の理論的雑誌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 Critiques* を発刊し、毎年 3 号刊行することを決定した。当誌はすでに東アジア文化批評の重要な雑誌となっている。この学会に関する報道は、鄒羽《理論與歷史：柏克萊“東方主義”之後全球文化批評中的東亞”研討會述評》(《今天》1992: 3, 香港：社會理論出版社, pp. 241-249) 参照。Tani E. Barlow は *Positions* 誌上の重要な論文をまとめて、「植民地の近代性」をテーマとした、*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という本を刊行した。同書にはリウの論文も収録されている。
- \*6 著者は James Hevia の観点に同意して、宣教師のエクリチュールは歴史事実を受動的に反映してい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歴史事実を作り出すことを企図した、あるいは実際に歴史事実を作り出し、後世の人々の歴史事実に対する認識を作り上げたというべきだと考える (p. 58)。James Hevia, "Leaving a Brand in China: Missionary Discourse in the Wake of the Boxer Movement," *Modern China*, 18: 3 (1992), pp. 304-332 参照。ほかに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研究に関しては、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 4 (1996), pp. 96-118 も参照。
- \*7 この本の中国語訳は、孫周興譯《走向語言之途》(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3)。余德慧《詮釋現象心理學》(臺北：會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8) における、ハイデッガー理論の紹介も参照。【日本語訳：ハイデッガー著、亀山健吉、ヘルムート・グロス訳『言葉への途上』(ハイデッガー全集 第 12 卷, 東京：創文社, 1996).】
- \*8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9 これは言語学者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 が繰り返し問題にしているものである。例えば、英語の frog は中国語の「青蛙」に翻訳可能だろうか。表面的に見ると、frog と「青蛙」はどちらも、四本足で緑色をした飛び跳ねることのできる小動物に対応する。しかし、英語の frog という単語の背後にある文化的意味あるいは、「青蛙」という単語が中国語世界においてもつ文化的意味あるいは異なる。こうして悲観的な人は、異なる言語間ににおける意味の変換は、最終的には不可能だと考えるのである。
- \*10 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生死場〉的啟示》(唐小兵編《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型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3) p. 31。【訳者補：傍点は評者(黄)による。】
- \*11 言語論的転回、およびそれが思想史、社会、文化の研究に与えた衝撃に関しては、多く

の議論がある。例えば、John E.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4 (1987), pp. 879-907; Richard M. Rorty,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2 著者は本書 25, 35, 87 頁の三か所で厳復に言及しているが、触れるだけで深い分析は見られない。熊月之には厳復訳の新語の歴史的運命を論じたものがある。彼によれば、厳復が苦心して練り上げた新語は、「物競」(生存競争)、「天択性」(自然淘汰)、「邏輯」(ロジック)などが後世も使われている以外は、「計学」(統計学)、「群学」(社会学)、「内籀」(帰納)、「版克」(銀行)など、ほとんどが日本から転訳された新名詞に淘汰された。また彼は、商務印書館が厳訳八種の後に付け加えた「中西訳名表」は 482 項を収めているが、そのうち今も学界で使われているのはわずか 56 項にすぎない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る(その中には厳復がそれ以前の翻訳、「歌白尼」(コペルニクス)、「美利堅」(アメリカ)などを踏襲しているものも含む)。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pp. 701-702。

\*13 この点に関しては、著者は明らかにサイードの観点——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t)論、文化純粹論への反対、東西二分法の不当性への批判、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は構築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に賛同している。

\*1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3) も女性と国民主体との矛盾した関係を深く分析している。

\*15 拙著はこうしたテーマに関わる別の一例である。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 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この本において、私はテクスト対照の方法によって、厳復がどのようにしてジョン・スチュアート・ミルの *On Liberty* (『自由論』) を『群己権界論』へと翻訳したかを分析した。彼の翻訳は実は再創造の過程であり、しかも中国の将来に関する彼の思索と密接な関係がある。

Transla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Max K. W. Huang (黄克武).